

红色收藏



朱德用过的竹手杖(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藏)

1956年春,山西省武乡县一处田地里,正在春耕开地的农民弓献玉,锄头突然碰到了一个硬物,他小心地拨开泥土,发现是一层层油纸包裹的长条物件。解开油纸,一根通体竹制、黑红色油漆、下端带有铜圈的手杖完好无损地重见天日。弓献玉顿时热泪盈眶——这正是他寻找了多年的传家宝。

这根手杖的背后,藏着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。

1938年4月,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于山西省沁县、武乡县西部山区,指挥八路军反日军九路围攻的战斗。在从义门村移驻到寨上村前,朱德的左小腿上生了一个疮。由于战事繁忙,疮口已经化脓,他不得不拄着一根竹手杖助行。

后来,朱德查访到一位弓姓老中医善治疮病,便决定前去寻医问药。一天下午,朱德拄着手杖找到老中医弓茂昭家里,请他治疮病。在老中医半个月的精心治疗下,朱德的疮疾痊愈,并且身体也逐步强健。

疮病治好,朱德要付药费和诊费,被谢绝了。弓茂昭说:“我是个穷医生,可我有许多穷朋友,我为你治病,就是为咱穷人的好军队治病,我是心甘情愿的。今后,如果咱队心里有疮病的,也可以来找我医治,我同样会分文不收。你们为咱穷苦人打天下,我能为自己的军队治病救人,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朱德觉得很过意不去,于是准备了一顿便饭招待弓茂昭以表谢意,之后,他拿起病中经常拄的那根竹手杖,说:“我是个当兵的,又在抗日战乱中,没有什么好礼物赠送的,就把我拄的这根竹手杖送给你做个纪念吧。”弓茂昭欣然接纳,高兴地说:“礼轻情意重啊。我也老了,收下这根手杖,让它陪伴我走乡串户为穷人治病吧!”

事后,弓茂昭才得知,他收治的病人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,便将这根竹手杖当成宝贝珍藏在身边。日军侵占当地时,弓茂昭用油纸将竹手杖包了又包,埋在房后的田地里。临终前,他将其侄子弓献玉叫到面前,告诉他手杖的事,并嘱咐他等战乱平定后及时挖出,好生保管,说:“那是咱家十分珍贵的传家宝。”

抗战胜利后,弓献玉曾多次寻找这根竹手杖,却都未能找到。幸运的是,在1956年春耕开地时,这根沉睡于地下的手杖终于重见天日。

1978年,山西省武乡县文物管理所在征集红色文物期间,寻访到了这根珍贵的手杖。弓献玉将其献出。这根竹手杖和朱德在寨上村驻扎时用过的水壶一起,在武乡革命纪念馆展出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落成后,此文物被移至该馆,展览至今。

# 海晏河清燕归来

郭悦



清乾隆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(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

今日春分。《周礼》有载:“日中,日夜分。”这一日,太阳直射赤道,昼夜均分。古人谓此为“平分”——春意自此升腾,万物开始真正醒来。从立春到立夏,九旬春光,春分恰居其中,平分春色;而天地之间,阴阳相半,寒温平和,正是人间最好的时节。

春分有三候,一候玄鸟至。玄鸟,即燕子。这种被古人视为神鸟的精灵,春分而来,秋分而去,年年如期,从不负约。燕子的翅膀里,藏着中国人对春天最古老的理解。

说起燕子,便想起一件稀世之珍——清乾隆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。此尊为景德镇御窑所制,原陈设于圆明园海晏堂。敞口短颈,丰肩鼓腹,肩颈之间雕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。霁青釉色,深沉如河;金彩绘就蕉叶缠枝,富丽而不失雅致。最妙是那对燕耳,振翅欲飞,恰应“玄鸟至”之候。

“海晏河清”,典出唐代诗人郑锡的《日中有王子赋》:“河清海晏,时和岁丰”。燕子谐音“晏”,霁青象征河清,一件器物,承载了多少祥瑞的期许。乾隆朝粉彩工艺至此臻于极境,雕、贴、凸压并用,数次入窑方成。此尊不仅是一件瓷器,更是一段盛世的注脚,一种天下太平的理想。

然而海晏堂早已不存。1860年,英法联军劫掠焚毁,十二生肖首流离失所,那件燕耳瓷尊也历经劫难。如今我们只能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,遥想它曾经伫立的殿堂。

# 娄烦神驹耀华夏

李培荣

汾河上中游,吕梁山脉环抱的娄烦,因盛产良马而闻名。境内一方斑驳石刻,将“屈产”“湿洼”的名号深镌石间,也将这片土地与良马结下了几千年的不解之缘。

## 屈产正名:金石为证的春秋溯源

娄烦马的荣光,始于春秋时期。《公羊传·僖公二年》记载,晋献公欲伐魏国,大夫荀息献奇策:“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白璧往,必可得也。”晋献公依计贿赂虞君,终成“假道伐虢”“唇亡齿寒”的千古典故。多年来,“屈产”地名众说纷纭,而娄烦境内的明代石碑给出了铁证:明成化三年(1467)《重修周洪山普净寺碑记》中有“屈产著士张仲原”;明嘉靖十八年(1539)《重修石峡寺记》中有“屈产五戒居士韩鉴”,直接将“屈产”锁定为娄烦境内古地名;明万历年(1573)《北作村改观音重修黄龙建立碑记》载:“乃地号者屈产汾源郡也”,以及石峡沟明嘉靖己亥年(明嘉靖十八年,1539)碑“兹有山名石峡,地号温泉,乃屈产之名峰,实娄烦之一境”的记载,更将汾河畔的石峡山划定屈产核心区,此地距1958年被汾河水淹没的旧娄烦城仅十余里。《读史方輿记要·交城县》“马兰城(今古交马兰镇)汉魏北齐皆尝牧马于此”的记载,可知古娄烦城周边的汾河沿岸广袤区域,正是春秋屈产的核心牧域。

良马的孕育,离不开得天独厚地理环境。娄烦地处盆地,山苍水碧,林茂泉幽,水草丰饶且草滩湿润多种野生草药。这里有严冬不冰的石峡温泉,有娄烦平地的醴泉(汾河水库未淹没时的盐土崖河滩),更有盐土崖河滩出产土盐的千亩滩地,种种天然禀赋,让这片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育马



秦永计 摄

宝地。《山西通志》亦载:“屈产之乘,出石峡。石峡,静地也(今娄烦县)。”“马出温水者良”直指石峡温泉为屈产良马的核心产地。其水流三十里不冻,为良马的冬季牧养提供了绝佳条件。娄烦先民正是凭借这份自然馈赠,培育出闻名遐迩的屈产良马,让娄烦成为春秋时期声名远扬的良马产地。

屈产马的声名,从未囿于典籍故纸。马沟、走马湾,庙湾与盐土崖交界处的老马坪,皆因良马得名;罗家屈、杜招屈、史家屈等村名,更是数千年前娄烦盛产良马的鲜活佐证。

## 湿洼实证:泉脉永续的天马传奇

如果说“屈产”是娄烦马的历史坐标,那么“湿洼泉”便是其生生不息的源头。

《史记》中“汉武帝得神马于湿洼水中”的传说,千百年来迷雾重重。明《永乐大典·山川》明确记载:“周洪山,在本县南七十里,高十五里,盘踞四十里,形势巍峨而奇秀。西北一十里有湿洼泉,其形如井。西有龙王庙,遇旱祈祷。”清康熙十八年(1679)《重修周洪山普净寺碑记》更直言“湿洼,即天马所生处也”,以典籍与铭文为湿洼泉的所在地盖棺定论。

周洪山位于娄烦北中部,其西北十五里龙池梁的龙洼,便是湿洼泉的真正所在。龙池梁属今娄烦县静游镇阳坡村地界,此地水源充足,林深草茂,地域广阔。当地百姓因地名与皇室相关,将“湿洼”称作“龙洼”。龙池梁上遗存的四块大石合围的泉井,以及重修的龙王庙遗迹,皆见证着这里曾是“天马出泉”的圣地。龙池梁的支脉由西向东延伸十余里,与周洪山脉的数道梁脊相接,直抵汾河岸边。绵延万亩的天然牧场,完美契合北宋王禹偁《大阅赋》中“屈产新驹,湿洼逸驾”的记载,为娄烦马的繁育提供了广袤的天然牧域。

汉武帝时期,娄烦为河东牧核心区,湿洼泉边的良马被视作“龙种”,成为皇家御用与沙场制胜的利器。相传汉朝名将霍去病、卫青北击匈奴时,骑乘的便是娄烦湿洼泉畔繁育的战马,其“卧而显小,立而显大,能驮善走,力大无比”的特质,成为征战沙场的制胜关键。唐卢纶《送史兵曹判官赴楼烦》以“湿洼龙种散云时”开篇,将娄烦马比作天马。

## 监牧辉煌:隋唐时期的军马脊梁

隋唐时期,娄烦马迎来鼎盛时期,成为皇家监牧体系的核心要地。隋大业四年(608),朝廷置楼烦郡,辖静乐、临泉、秀容三县,郡治设于今淹没的旧娄烦城,李渊曾任郡守。唐代监牧规制愈发完备,《新唐书》记载:“凡马五千为上监,五品官掌;三千为中监,六品官掌;余为下监。监皆有左右,因地为之名。”清晰勾勒出层级分明、权责清晰的唐代马政的监牧制度。河东马邑人张万岁首任太仆寺少卿,执掌马政20余年,悉心管理将楼烦马打造成盛唐战马的核心供应地。唐朝

# 南青北白两相宜

钩希

五代十国时期,我国瓷器形成了“南青北白”的格局。这不是简单的地理分界,而是南北审美、工艺和智慧的并立。

当时,北方大地战火纷飞,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却维持了70多年安定。钱氏三代君主奉行“保境安民”之策,向中原纳贡称臣,换得一方太平。贡品中,最负盛名的便是秘色瓷。

秘色瓷产于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。唐代陆龟蒙写诗夸它“九秋风露越窑开,夺得千峰翠色来”,五代徐夤形容它“巧剡明月染春水,轻旋薄冰盛绿云”。1987年,陕西法门寺地宫开启,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,其中13件与地宫《衣物账碑》上“瓷秘色碗七口”的记载完全吻合,世人才确定这种瓷器真实存在。2015年至2017年,考古人员在慈溪后司岙遗址发现瓷质匣钵,上面刻着“罗湖师秘色碗”字样,至此秘色瓷的产地首次得到了确定。

秘色瓷的釉色,不是单纯的青。它像远山含黛,像秋水微澜,像薄冰盛绿云。胎质细腻,釉面莹润,追求的是“如冰似玉”的境界。为了达到这种效果,吴越工匠发明了瓷质匣钵装烧法。器物单件入匣,用釉料密封匣口,在窑火中隔绝氧气。这样烧出的瓷器,釉中二价铁含量增加,呈现出独特的天青色。

代价是成品率极低。十窑九废,不计工本。秘色瓷不仅专供吴越国王室,同时也大量进贡中原地区。北宋皇陵、辽代贵族墓中,都有秘色瓷出土。辽祖陵的龙凤纹大盘,陈国公主墓的对蝶纹盘,都是秘色瓷中的精品。北宋太平兴国三年(978),吴越国纳土归宋。这抹天青色并未消失,反而影响了后来的汝窑、南宋官窑,直至龙泉青瓷。

与吴越秘色瓷的温润不同,北方白瓷走的是另一条路。

白瓷诞生于北朝。北方窑工借鉴南方青瓷技艺,控制胎釉中的含铁量,剥离铁的显色干扰,终于烧出

右图:北宋白瓷花卉纹枕(山西博物院藏)



左图:元白瓷划花卷草纹盖罐(山西博物院藏)

了白色瓷器。

唐代邢窑是北方白瓷的代表。唐代李肇在《唐国史补》有“内丘白瓷,端溪紫石砚,天下无贵贱通用之”的记载,说明邢窑白瓷在当时深受人们喜爱。

五代时期,邢窑衰落,定窑崛起。定窑在河北曲阳,晚唐五代时期开始烧造白瓷。它继承了邢窑的技术,又有创新。定窑白瓷胎质坚细,釉色白中泛黄,采用覆烧法,产量大增。

与秘色瓷的官廷专属不同,北方白瓷从一开始就面向更广泛的市场。它既可作为贵族用器,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。沿丝绸之路,远销西域;经海上航线,销往东南亚各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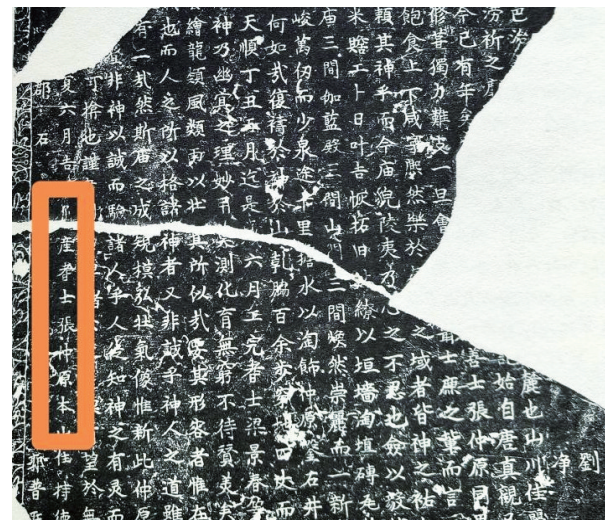
白瓷的流行,与北方多民族环境有关。契丹、党项、女真等民族,都喜爱这种素净的白色。宋辽夏金时期,白瓷成为北方各民族的共同审美。

山西介休窑、天津窑、霍州窑,在宋金时期兴盛。介休窑发明的“三支钉”支烧法,在霍州窑演变为“五支钉”,提高了产量和美观度。科学检测表明,部分山西白瓷的白度,甚至超过了定窑。

秘色瓷与白瓷,代表了两种制瓷哲学。秘色瓷追求极致。它不计成本,不惜工本,只为那一点天青。它是“官窑”制度的早期形态,由官方垄断资源,专门烧造贡品。每一件都是孤品,难以复制。白瓷讲究实用。它面向市场,技术不断革新,产量持续提升。从邢窑到定窑,再到各地民窑,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。它是“民窑”的代表,靠市场竞争生存。

两种路径,各有优劣。秘色瓷的巅峰期很短。五代后期以后,质量开始下降。北宋后期,越窑衰落,秘色瓷不再作为贡品。

白瓷的生命力更强。从北朝到元代,延续了近九百年。它不仅满足国内需求,还远销海外,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。



明成化三年《重修周洪山普净寺碑记》,框中文字为“屈产著士张仲原”(作者供图)

贞观至麟德年间,边境养马达“七十万匹,色别为群,望之如云”,楼烦监所产之马“与西种马并重于时”,成为唐军骑兵的核心战力。

彼时的娄烦,牧群遍野,蹄声震天,监牧遗存随处可见。周洪山下蒲峪梁的唐大中年(850)墓碑,记载着楼烦监衙前将刘元臻的事迹;下马城寿圣寺唐元和十五年(820)的经幢,留下了“摄玄池监令杨立言”的官署印记。这些遗存共同勾勒出楼烦监牧的繁荣图景。

## 乱世博弈:鞍骨撬动的历史转折

盛极一时的楼烦监牧,在唐末成为撬动历史走向的关键。《新唐书·兵志》明确记载:“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,阴选胜甲马归范阳,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。”楼烦监虽地处太原西北,却不受河东道管辖,培育的战马质量远超其他牧群,安禄山凭借“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”的官职,合法掌控楼烦监,将精选的良马悉数转运至范阳,为其日后叛乱做好了准备。

安史之乱后,陇右牧场被吐蕃劫掠殆尽,“国马尽没”,楼烦监顺势成为唐军战马的主要供应地,维系着唐朝军事的残存元气。唐贞元十五年(799),朝廷任命杨钊为楼烦监牧使,明确其“专领监司,不系州司”的权限,将楼烦监收归中央直管,试图重振马政;然唐末乱世已至,沙陀首领李克用父子深知楼烦马的战略价值,“数侵掠并、汾,争楼烦监”。唐昭宗元年(889),李克用表置宪州,下辖楼烦、玄池、天池三县,在原楼烦监西一里建县城,将这片千年牧地纳入河东节度使管辖。此后,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东出太行,逐鹿中原,楼烦监牧场始终是其麾下铁骑的核心战马供应地,在五代十国的风云更迭中,见证着权力的交替与历史的变迁。

千年流转,汾河水库淹没了旧娄烦城的遗迹,却掩不灭娄烦良马的基因。如今,娄烦境内仍留存着马家庄、马家岩、马道沟等众多带“马”字的地名,承载着当年的牧养盛况;蒲峪村的唐碑、下马城的监牧遗存、龙池梁的湿洼泉遗迹、石峡温泉的屈产故地,共同构成了娄烦良马文化的鲜活印记。

二月二,龙抬头,又称春耕节、农事节、青龙节、春龙节等,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。“龙抬头”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关,是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,在每年二月春分以后的黄昏,龙角星从东方地平线出现,这时整个天龙的身子尚隐没在地平线之下,故称“龙抬头”。

在夔大夫祠南殿的红墙上,嵌着四枚琉璃团龙圆盘,似四块凝固的流光,将元代的凤帽锁在这斑驳的釉色里。这琉璃团龙,是元代匠人揉碎了汾河的泥,熔铸了太行的火,捏塑出的龙形。圆盘中央一道深痕,将龙身劈作两半,却未折断龙的筋骨。龙身盘绕如古藤,鳞甲层层叠叠,似被岁月磨去了锋芒,却依旧能看出当初刻画下的力道:每一片鳞甲都顺着龙身的弧度起伏,每一道龙须都带着迎风飘动的姿态,连龙爪扣住的云纹,都卷着灵动的曲线。元代的琉璃工艺本就以粗犷雄浑见长,这团龙虽不如明清龙纹的精致雕琢,却多了几分源于草原的豪迈:龙首不怒自威,眼窝深陷,吻部宽阔,仿佛刚从塞北的风沙里腾跃而出,带着一股未经雕琢的野性。琉璃的釉色早已褪去当年的明艳,白釉泛着象牙黄,蓝釉晕成浅灰,仅在龙角与云纹的缝隙里,还残留着一星半点的孔雀蓝。

这釉色不是衰败,而是时光的沉淀。

元代的琉璃匠人,将陶土反复捶打,入窑时用还原焰烧出琉璃的剔透,再以氧化焰定色,让釉料与胎体熔成一体。元代是中国琉璃工艺的转折期,此前的琉璃多为小件饰品,元代则将其大规模用于建筑装饰,夔大夫祠的团龙便是这一变革的实证。这四枚琉璃团龙胎体厚重,直径近一米,如此大尺寸的构件,需要精准把控窑温与胎体的收缩率,稍有不慎便会开裂变形。而这四尊团龙虽有残损,却整体完整,足见元代匠人技艺的精湛。更难得的是,团龙的造型打破了传统龙纹的对称范式,龙身的盘绕并非刻板的圆形,而是带着动态的扭曲,云纹也并非规整的卷云,而是如浪涛般翻涌,这与元代绘画中“逸笔草草”的审美一脉相承。

过二月二,是对民俗节日的传承;看龙抬头,是对文化自信的赓续。站在夔大夫祠的团龙前,琉璃团龙讲述着历史,泥与火的交融,匠人的巧思,元代的审美,都凝固在这团龙的轮廓里。



元代琉璃团龙之一(作者供图)

# 夔大夫祠团龙

邢占平